

# 意共在隆哥時期的路線論爭 (1964—72)

熊 自 健

## 一、六十年代的新挑戰

一九六四年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 (P. Togliatti) 病逝於雅爾達，他的副手隆哥 (L. Longo) 繼任為意共新總書記。一九六四年九月隆哥在意共的機關刊物「再生」(Rinascita) 週刊上公佈陶里亞蒂的「雅爾達備忘錄」，並且在同年十月公開宣稱：他將繼續陶里亞蒂的方向<sup>①</sup>。然而意大利經過戰後廿年的重建，已發展成爲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並且是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同時意大利政府也從中間右翼的聯盟轉向爲中間左翼的聯合政府；戰後的一代業已站立在選民的中間。因此意共必須面對這些新局面，痛苦的思想如何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進一步得出社會主義的革命路線來。以往意共在法西斯的壓迫下，在一個深具威望的領袖陶里亞蒂長期的領導下，已逐步的發展爲「歐共主義」的先行者；而今意共爲了如何延續「歐共主義」以及克服當代的挑戰，却產生了許多針鋒相對的意見與派系。在隆哥領導意共的時期內（一九六四—一九七二），意共內部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路線論爭。這些論爭大致是環繞在下列五個問題上展開辯論：(1) 當代資本主義的性質問題；(2) 意共是否應參與政府問題；(3) 改革黨的結構問題；(4) 革命策略問題；(5) 未來社會主義的方向問題。本文僅對複雜的意共路線論爭簡述其大要，並且說明它對今天意共「歷史性妥協」路線的影響。

意共內部第一回合的論爭是德拉·沃爾佩學派 (Della Volpean School) 的理論之爭。「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意共內部路線的論爭是從理論問題開始的。

當意共在一九五六年召開「八大」之後，意共邁出獨立自主之路；意共黨方努力復活葛蘭西 (A. Gramsci) 的理論，做爲新

<sup>①</sup> W. Leonhard, *Eurocommunism: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 tr. English by M. Vecchi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pp. 173-174.

路線的基礎與依據。但是在意共內部同時也誕生了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德拉·沃爾佩學派。這一學派的主要成員是德拉·沃爾佩 (Della Volpe) 以及他的學生們。其中最出色的是德拉·沃爾佩的高足柯雷蒂 (L. Colletti)。這個學派之所以誕生是由於他們不滿意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他們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前輩們如拉布里奧拉 (A. Labriola)、克羅齊 (B. Croce)、葛蘭西……等這些唯心主義色彩較濃的馬克思主義者，做了一番批判與反省，認為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太重視「歷史絕對主義」，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此外，德拉·沃爾佩學派還企圖從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導引出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正確解析。這個學派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主持意共的理論刊物「社會」(Società)，並且出版一系列的著作，造成意共黨內一股可觀的影響力。他們在政治路線上的基本觀點是：(1) 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對當代資本主義作了不正確的理解，亦即用含糊的人道主義以及黑格爾的修辭學去取代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該學派主張從頭開始重讀馬克思的原始著作，以便引出正確的結論，把社會潛在的階級鬥爭改造成為積極的階級鬥爭。(2) 該學派認為意大利已經進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林，具有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他們不能同意意共黨方一再宣稱的教條：意大利是尚未成熟的資本主義，因此意共認為意共必須協助發展民主政治與經濟改革，以防止法西斯的倒轉；同時意共將在憲法的架構內，以民主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sup>③</sup>。該學派指責此一教條破壞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與科學性。

由於德拉·沃爾佩學派從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來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與「科學性」，因此他們重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相當深入的反省，並且建構出一套新的觀念。但是這套革命性的理論抵觸了意共當局，尤其抵觸了陶里亞蒂的權威，於是意共在一九六二年解散「社會」雜誌的編輯部。該學派只好專心著述，一方面闡揚哲學的新理念，另一方面以刀筆批評意共。該學派的大將柯雷蒂在赫魯曉夫下臺時，感到他自一九五六年以來所期待國際共運的革新不能發展完全，於是他在一九六四年懷著失望的心情退出意共。到了一九六八年德拉·沃爾佩逝世之後，該學派只能站在意共之外叫嚷而已。德拉·沃爾佩學派的興衰可以視為意共內部第一回合有深遠影響的論爭。雖然該學派的成員退出了意共的舞臺，但是他們的觀念仍繼續影響意共黨員，在意共內部發展為激烈派。我們在後面將敘述這股激烈的勢力在一九六八年大風暴來臨時所表現的驚心動魄的場面<sup>④</sup>。

意共內部第二回合的論爭是左派領導人物因革拉歐 (P. Ingrò) 與右派領導人物阿曼杜拉 (G. Amendola) 之間的辯論。意共早在六十年代的初期就形成這兩大派系，但是等到陶里亞蒂逝世之後，才明顯的出現相互爭執路線問題。這一回合的論爭曾經對聯盟路線問題、結構改革問題、改革意共問題、意大利未來的發展問題、國際共運問題，提出全面性的論戰。直到一九六六年意共召開「十一大」，才形成意共新路線之初步的決議，解決了兩派第一次尖銳的衝突。阿曼杜拉暫時領先，因格拉歐慘遭挫

註③ P.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1979) pp. 40-42.

註④ See L. Colletti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 *New Left Review*, No. 86, July-Aug., 1974, pp. 3-9.

敗。總結兩派論爭的要點如下：

(1) 意大利未來發展的問題：戰後意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意大利社會產生許多深遠的改變，因此意大利是否成爲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一切爭辯的前提。意共左派人士悲觀的認爲：意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導向「福利國家」，工人階級將整合於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意大利從一九六二年形成中間左翼聯合政府起，加速了朝向福利國家的前進步伐；而工人階級勢必逐步的整合於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到這個時代來臨時，意共將孤立無助。因此意共左派人士提出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反對資本主義在意大利境內的擴張。意共右派人士則認爲意大利中間左翼的聯合政府不能解決意大利因發展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而南意大利仍舊是落後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需要進行民主革命。同時由於意大利中間左翼政府不能解決意大利的危機，將促進意共參與政府的可能性。此時意共應貫徹其「社會結構改革」路線來獲取一個多數派政府。

(2) 聯盟路線問題：意共左派的目標是直接朝向社會主義前進，因此聯盟不是一個核心的問題，而社會主義有賴於無產階級積極的奮鬥。意共左派人士一再強調小商品生產以及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都失去重要性，今天意大利的經濟命脈掌握在大企業手中，因此意共必須以大企業的工人階級爲中心力量努力形成一個「新的歷史性集團」(new historic bloc) 進行奪權，而不應以改革社會結構來號召中小企業家來加入聯盟，共襄盛舉。意共右派人士則堅守陶里亞蒂的教條，強調意大利的落後性及其特殊性。意共只有以工人階級爲主力，聯合中小企業家與農民，共同反對意大利的壟斷資產階級。如果意共直接向社會主義冒進，升高勞資雙方的尖銳鬥爭，將引發資產階級血淋淋的鎮壓與法西斯的倒轉。意共最好以聯盟的方式，走民主的道路，獲取政權。

(3) 改革意共結構問題：意共左派向「民主集中制」——意共組黨原則進行挑戰，要求黨內完全民主化。意共左派提議全體黨員自由公開討論任何問題與民主參與各種政治活動。意共左派認爲只有通過黨內完全民主才能造就出無產階級高度的文化水平，以便向資產階級奪取思想領導權。這樣方可順利的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並保障社會主義的民主。意共右派則基於聯盟的必要來考慮黨紀的重要性。如果不嚴格的執行黨紀，以貫徹黨的政策，則意共與其它勢力聯盟的路線將無法推行，意共將陷於孤立。意共右派號召建立一個新的政治聯盟，一個左翼力量與民主勢力的結合。

(4) 國際共運問題：意共左派比右派更加激烈的批評蘇聯。意共左派希望建立一個新的歷史性集團來建設一個與蘇聯不同的社會主義。意共右派則希望維持黨的統一，力阻進行對蘇聯本質的分析；因討論蘇聯是否爲社會主義的問題勢必引起意共的內鬨，同時加深意共與蘇共之間的緊張。此外，意共左派比較同情中共。意共右派則努力維持意共一方面走獨立自主的道路，另一方面不與蘇聯正式破裂④。

意共內部左派與右派經歷了兩年熱烈的辯論之後，在一九六六年意共「十一大」大會上分出勝負。意共「十一大」大會上，

註④ See. G. Amyot,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London: Croom Helm Press, 1980). pp. 57-67.

由隆哥與貝林格 (E. Berlinguer) 領導的主流派，大力支持阿曼杜拉右派的路線，獲得意共的新方向。意共「十一大」確認意共繼續陶里亞蒂的方向<sup>⑥</sup>。同時意共也提出若干新目標：(1) 意共號召從事一種社會結構的改革。這項改革包括地方自治，減少中央官僚機構的數目與權力，改革教育以增進個人創造能力，反對民族歧視，反對意大利日益加深的壟斷資本主義趨勢。(2) 意共倡導一種新的政治聯盟。意共號召全體黨員與所有的左翼份子進行公開與坦誠的溝通，以民主的方式來形成新的政治聯盟；但意共黨員與社會主義者結合時必須堅持鬭爭的方向——一個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方向。意共認為新的社會主義將不僅僅是共產主義者所希望的，而且也是所有志願協力建設它的人所希望的<sup>⑦</sup>。

意共「十一大」終於提出清楚的改革路線來對抗意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意共也堅持其同盟路線；這個方向正是陶里亞蒂方向的延續，並且又進一步發展了「歐共主義」。英國 Queen 大學教授 G. Amyot 分析意共左派受挫的原因有：(1) 意共左派的興起是由於意大利經濟復興奇蹟所帶來的反應，然而意共左派在政治路線上並無一致性的看法與做法。意共右派則堅守陶里亞蒂的教條，一致反對意共左派分歧的言論。由於意共已經是一個龐大的羣衆政黨，因此它不免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僵固性，難以變通。(2) 意共左派犯了戰術上的錯誤。因格拉歐意圖建立一個新的歷史性集團，主張與意大利天主教徒携手共進，但是却没有區分意大利基督教民主黨 (DC) 並不包含在意大利天主教徒陣營之中。同時因格拉歐也沒有在他的政綱中聯系一些具體的問題，以致造成空泛與含混的社會主義概念。最糟的是因格拉歐本人缺乏充沛的戰鬭力，他沒有努力去澄清這些令人困惑的概念，也不去積極的組織一支隊伍來捍衛他的觀點。(3) 意大利的歷史發展證明了意共右派的觀點是正確的。意大利中間左翼的政府不能穩住政局，無力解決意大利的危機；工人階級也沒有整合於資本主義體系之內，仍舊表現出巨大的革命力量。因此意共左派在一九六六年意共「十一大」之後放棄了他們奮鬥的方向；直到一九六八年大風暴時，因格拉歐還是不能充分的欣賞一九六八年所興起的新左派革命力量<sup>⑧</sup>。

意共「十一大」雖然提出了新路線，但這條新道路並不能給意共帶來蓬勃的發展；相反的，當一九六八年革命風暴來臨時却顯示出意共不能恰到好處的掌握這股由下而上的革命力量，遂致造成意共的危機與分裂。

註⑥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YICA). 1966. Document 10 "Political Resolution of the 11th Congress of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p. 613.

註⑦ *Ibid.*, pp. 611-613.

註⑧ G. Amyot, *op. cit.*, pp. 162-168.

## 二、一九六八年意共的危機與出路

一九六八年意共經歷了它戰後第一次的危機與分裂。促成這次危機與分裂的事件是捷克布拉格之春與歐洲學生工人暴動。

「布拉格之春」的理論與實踐，解答了多年來意共內部對於「民主與社會主義之關聯」的爭論，提供了最具體的範例。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甚至是在捷克共產黨一月的全會之前，意共已經清楚表示歡迎並且支持捷克的改革。三月，隆哥指出捷克「布拉格之春」給予社會主義以自由、人道與民主的真正面目<sup>⑧</sup>。四月，隆哥在一個出版會議上宣稱：「我們擁護一個多元主義的國家，這個國家以全部民主的力量來合作，來從事生產活動，他們心甘情願的協助建立社會主義……意大利的社會主義將照參與建設行列的各種力量所希望的去發展……我們擁護最廣泛的民主，我們擁護在建設社會主義期間，不僅存在着一個與另一個手段之間不同的政黨，而且存在着基本原則之間不同的政黨」<sup>⑨</sup>。五月，隆哥訪問布拉格，吸取經驗。在布拉格的一個出版會議中，隆哥強調：「捷克今天所發生的事，對於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對於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共黨，在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年輕、公開、現代化——的奮鬥途中，更具有特殊的助力」<sup>⑩</sup>。當蘇聯入侵捷克之後，隆哥在八月廿七日意共中央委員會的演講中以意共之名尖銳的指責蘇聯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帶給意共兩方面的影響：(1)在國際共運上，初次形成歐洲共黨的聯合陣線；意共對「布拉格之春」的支持，獲得了法共、西共、英共等歐洲共黨的追隨。同時，意共也遭受到蘇聯集團的批判。蘇共批評意共「多元中心」概念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概念」，它的主要目標是「企圖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其它親蘇國家並不限制他們的出版界參與論戰，而且是直接的介入。例如以意大利文寫作但是在東德出版的親蘇小冊子，曾對蘇聯入侵捷克提出辯護，並被送往意共地方支部與意共幹部中去<sup>⑪</sup>。意共與蘇聯集團的對峙，助長了意共內部親毛派的勢力，引發了爭執。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壓力，愈來愈大。(2)「布拉格之春」結束之後，意共理論刊物「再生」出版了一系列的論文，繼續討論社會主義與民主的關係，討論黨與國家的關係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矛盾與問題等。隆哥、阿曼杜拉、因格拉歐、貝林格、格魯比（L. Gruppi）都各顯神通，表達他們的看法，爭奪意識形態的領導權<sup>⑫</sup>。

一九六八年在西歐也是不平靜的一年。法國的「五月革命事件」——以激進派學生運動領頭而發展為全國大罷工——迅速的波及到西歐各國，有人稱之為「歐洲版的文化大革命」。示威的羣衆走向街頭，高喊改革社會制度，把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以

⑧ K. Devlin "The New Crisis in European Communism", *The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v.-Dec., 1968, p. 58.

⑨ W. Leonard, *op. cit.*, p. 174.

⑩ K. Devlin, *op. cit.*, p. 59.

⑪ W. Leonard, *op. cit.*, p. 175.

⑫ K. Devlin, *op. cit.*, pp. 62-63.

備民主的性格。意共也必須改善它與青年、學生之間的聯繫<sup>⑭</sup>。

意共「十二大」的路線反映出意共經歷一九六八年危機之後的方向，它吸取了一九六八年的經驗與教訓，以和平、民主改革來謀求意共的新出路。然而意共「十二大」的路線只是代表隆哥、貝林格等主流派的意見，並不能團結意共內部旗幟鮮明的派系。從一九六九年，意共的激烈派、右派、左派與工會組織都提出他們各自的路線來，也都認為他們本派的路線才是通往社會主義的意大利道路。

### 三、探索意共新路線

意共「十二大」之後，意共黨內出現清楚的派系。除了貝林格所領導的主流派之外；有阿曼杜拉領導的右派，他們準備參與政府、保衛民主；有因格拉歐領導的左派，他們用心發展新的社會主義概念；有拉瑪（Lama）領導的工會政治派，走工會獨立與社會改良主義路線；還有激烈派的「宣言團體」（Manifesto Group），提出鮮明又具體的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意共各派之間展開尖銳的路線論爭，同時在路線論爭中也進行權力鬥爭，直到一九七二年意共召開「十三大」之後才告一段落。

阿曼杜拉於一九六九年八月發表論文「一個擁護政府的政黨」（A Party for Government）。他強調意共自發展新型態的政黨以來，就一直準備參與政府。特別是當意大利處在一個危機的時刻中，更是隨時可與政府合作，共渡難關。阿曼杜拉從三方面來論證參與政府的可行性。(1)當前意大利處在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中，政治、經濟以及國際局勢的危機都迫使意大利政府必須進行社會結構的改革來阻止危機的擴大。一個政府要順利的進行結構性的改革必須依賴堅定的民意支持。意共素以改革為號召，因此意共面臨了參與政府部門這個問題。(2)目前意大利中間左翼政府倒臺，顯示出這個國家已面臨一個抉擇，同時也說明了意大利政府如果沒有共產主義者支持將難以進行統治。如果一個新的大多數民主力量不能迅速的建立起來，那麼將給予意大利極右派（新法西斯）一條出路。目前反革命活動業已積極的展開，意共必須全力奮戰，所以參與政府不再是理論上探討的問題，而是政治行動的問題。(3)意共本身的發展已經達到一個轉捩點。意共廿年來在它與基督教民主黨的鬥爭之中，從未忘記它在國家統一中所扮演的角色。當意共表現它在統一意大利過程中的功用時，不僅僅只在負責的管理民主制度，同時也應該對於國家最迫切的問題提出正面的方案，擁護政府。意共始終是在促進一個廣泛的政治聯盟與社會聯盟，以創造出共產主義的力量能參與政府部門之中<sup>⑮</sup>。

貝林格批評阿曼杜拉的論點，認為參與政府的時機尚未成熟<sup>⑯</sup>。但是意共是否參與政府却引起意共內外熱烈的辯論。因格拉

<sup>⑭</sup> YICA, 1970, p. 214.

<sup>⑮</sup> Ibid., pp. 828-830.

<sup>⑯</sup> Ibid., p. 215.

歐等人則瞧不起新的改革派路線，想尋找另一條新的出路。但是他們尚未能發展出一個完整的新路線，只能用心經營一九六八年的經驗：文化革命，自發的民主運動、工廠會議、平等主義、反對黨的官僚主義、支持大膽的解放綱領、革命的工團主義，以及組織新的生產組織的烏托邦。因格拉歐以及左傾的工團主義者推動反對的方向，他們企圖把意大利的危機推至一個極端的結論<sup>⑥</sup>。此外，另一惹人注目的却是意共的工會領袖拉瑪，他推動工會獨立，企圖轉向工會政治。一九六九年意大利工會總同盟（CGIL）正式脫離意共的控制，走向自主，恢復傳統的工會角色，爭取工人一般福利並推動社會改革。工會不再扮演共產黨「輸送帶」的角色。貝林格強調當工會推動改革時，不要忘記共黨在國會中擁護所有社會與經濟的改革方案才是決策中心所在，而且當工會獨立推動社會改革時，必須爭取其它的羣眾組織共襄盛舉，尤其必須與共產黨合作。阿曼杜拉則警告工會勿重蹈「經濟主義」的老路而忽視了政治鬭爭的重要性<sup>⑦</sup>。

一九六九年意共內部路線論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激烈派的政綱。意共激烈派熱情的迎接一九六八年的革命風暴，發展出一套具體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他們發刊「宣言」（Manifesto）雜誌，被稱之為「宣言團體」。他們所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方向如下：

(1) 革命理論：宣言團體宣稱西歐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給社會主義革命提供成熟的革命條件。社會主義被提到議事日程中來，並非由於馬克思所預料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所造成的必然崩潰的結果，而是由於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浪費自然資源、不能促進生活在質量上的轉變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活，充滿了異化、個人日益孤立，同時不能妥善解決社會變遷中各種新的要求，如建立新型態的家庭等。

(2) 革命策略：宣言團體倡導在資本主義的矛盾中，進行改造生活質量的社會主義革命時必須發展新形的階級鬭爭。這種新形的階級鬭爭是源自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以及資本主義把國家從市民社會分離出來。社會主義將消除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把工作與學習結合起來。社會主義將從市民社會中直接組織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的委員會，完全自治，讓國家消亡。社會主義革命的步驟：(a) 統一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宣言團體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科技專家、知識份子、被壓迫的少數人民都是革命決定的主要力量；這個階層的人將與無產階級共同携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b) 中立中產階級。宣言團體宣稱撤銷一切官僚、白領階級、文化界人士的職位，重新組織新的政治、文化、經濟機構，以委員會的方式進行各種活動。(c) 與農民結合，發展社會主義的農業政策，集體管理土地與農場。宣言團體認為南意大利並不是一塊孤立而落後的地區，也沒有被資本主義消滅，却日益整合

註⑤ L. Colletti "Three Faces of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elos*, No. 42, Winter, 1979-80, pp. 118-119.

註⑥ See P. R. Weitz "The CGIL and the PCI: From Subordination to Independent Political Force" in L. M. Blackmer and S. Tarrow, ed., *Communism in Italy and Fr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541-571.

在意大利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因此，在南意大利適合一種反資本主義革命綱領，以解決當地人民所受的挫折與不適。(d)決不與中小資產階級聯盟來反對壟斷資產階級。

(3)革命組織：宣言團體認為革命政黨必須是一個無產階級羣衆政黨，取消民主集中制。政黨的主要功能在於統一步調以及奪取社會上思想領導權，並非指導工人階級的奮鬥。在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政黨與各種委員會扮演相同的角色，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否認以前剝削階級具有平等的權利而已，而非如列寧所云是暴力鎮壓。建設社會主義時，將由羣衆直接組成各種委員會來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活動；全面發展人性，取消分工<sup>①</sup>。

此外，宣言團體還猛烈的批評蘇聯，以澄清他們想要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同於蘇聯。從以上簡要論述宣言團體的革命綱領之中，我們可以清楚的明瞭此派人士遠離意共辛苦經營的「歐共主義」路線，必然慘遭意共各派人士的圍剿。一九六九年十月意共針對宣言團體提出黨內的辯論會。宣言團體的革命綱領只受到若干極左知識份子的欣賞，於是意共開除宣言團體，該派人士於一九七〇年後另組一政黨。

意共「十二大」之後，各派系互相競賽，各自標榜一條通往社會主義的意大利道路。但是經過歷史考驗，證明各派的路線都是不成熟的，並沒有給意共帶來蓬勃的發展，更沒有使意共獲取政權。意共雖然在路線鬥爭中失去以往的統一與團結，但是意共依舊能穩住陣腳，而且略有成長。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李昂哈得(W. Leonhard)認為意共日益增加其影響力可歸功於下列的趨勢以及意共不斷的努力：(1)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初期，意大利進行密集式的現代化與都市化，導致它與傳統破裂以及它與經常保守的外觀破裂，並且日益增加開放朝向新的觀念與新的目標。(2)在基督教民主黨統治下，腐化、分裂與內部鬭爭致使羣衆的不滿日益上升。(3)中間左翼聯合政府沒有能力來成功的應付國家決定性的問題，愈來愈多的意大利人認為要成功的應付難題只有通過與強大的共產黨積極的合作。(4)由於意大利社會日益世俗化以及教權主義的沒落，愈來愈少的意大利人願意讓教會指導政策。教會對選舉的影響已在消退，同時教會本身的反共也是微弱的。(5)最後，我們必須考慮到青年選民日益重要。這些青年選民不再記得冷戰，不再記得四十年代末期與五十年代基督教民主黨員與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對抗<sup>②</sup>。李昂哈得還特別強調：這些客觀的事實並不足以完全解釋意共壯大的理由。意大利共產主義者有能力應付新的問題，這才是意共成功的決定性因素<sup>③</sup>。

誠如李昂哈得所云，意共的壯大得力於它有應付新的問題。意共進行路線的論爭以及不斷靈活的調整其路線，正是意共

註① See G. Amyot, *op. cit.*, pp. 180-189.

註② W. Leonhard, *op. cit.*, pp. 182-183.

註③ *Ibid.*, pp. 182-183.



應付新問題的表现。但是在意共路線論爭的過程中有件事值得我們警覺，那就是意共留下了開除反對派與異己份子的紀錄。這一點恰好反證意共尚未能落實它所標榜的「黨內民主」。如果意共連「黨內民主」都不能做好，這就難以使人相信意共能够履行「以民主的道路通往社會主義」的諾言了。

一九七二年意共召開「十三大」，會上貝林格當選總書記，隆哥則接受一項新的職位成爲意共主席。貝林格當選總書記，說明意共新起的一代接下了權杖，意共將踏上新的里程。同時它也說明意共的路線論爭已決定出勝負。一九七三年貝林格具體的提出了「歷史性妥協」路線。意共在這一條新路線指導下，爾後的路線論爭也只環繞在「歷史性妥協」路線的一些枝節問題上打轉。以前多彩多姿的路線爭論，已成爲隆哥時代的歷史回憶。

# 新書介紹：「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恭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國內（郵掛）新臺幣一〇元  
國外——平郵 美金三元  
航空 美金七元五角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

